第 44 卷 第 8 期（总 288 期） 自然辩证法通讯 Vol.44, No.8 (Serial No.288)
2022 年 8 月 Journal of Dialectics of Nature August 2022

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在日本：从万叶博物学到里山模式

Arcadian Natural History in Japan: From 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nyo to the Satoyama Model

邢鑫 /XING Xin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School of Marxism,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摘　要：如果说帝国型博物学的发展局限于近代西方文明，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则出现在人类诸文明的博物学传统之中，其共同特征是天人和谐的乌托邦理念。对日本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传统的考察有助于从非西方视角丰富其理解。17世纪李时珍《本草纲目》的东传刺激其形成了以辨物为核心的本草学传统。19世纪初，本草学与国学的交汇促进了万叶博物学的兴盛，幕末本草家畔田翠山可谓集大成者。万叶博物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感受、认知和体验自然的方式。日本近代化所导致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激起了部分有识之士的抗议，博物学家南方熊楠在反对运动中集中论述了神社周围的镇守之森的重要性，回应了如何在现代社会维持日式自然的挑战。战后高速成长导致日本环境问题丛生，197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使得里山模式成为备受推崇的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实践方案之一。

关键词：和歌　神道教　自然圣境　南方熊楠　生态文明

Abstract: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imperial natural history was limited to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Arcadian natural history emerged among all civilizations, with the common feature of the utopian concept of harmony between nature and man. The case study of the Japanese arcadian natural history helps to enrich its connotations from a non-western perspective. When the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by Li Shizhen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in the 17th century, a tradition of natural history was formed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natural objects at its core.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he confluence of natural history and Kokugaku contributed to the flourishing of natural history of Manyo, of which the late Edo scholar Kuroda Suizan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Natural history of Manyo provided for Japanese a way to feel, know, and experience natur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s a result of modernization in Meiji Japan provoked many protests, and the scholar Minakata Kumagusu focused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Jinshu no Mori around shrine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 his campaign against the shrine enshrinement, responding to the challenge of how to maintain Japanese-styl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modern society. High growth in post-war Japan has led to various types of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since 1970s has made the Satoyama model a kind of arcadian natural history project highly respected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society.

Key Words: Waka; Shinto; Natural sacred site; Minakata Kumagusu;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N09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2.08.002

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共同挑战。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需要各国之间的精诚合作，更需要重新思考、发掘各国关于天人关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亚视野下的日本江户时代本草学研究”（项目编号：20CZX017）。
收稿日期：2021年5月6日
作者简介：邢　鑫（1987–）男，浙江金华人，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博物学史。Email: cauxx@126.com

系的文化资源。诸文明的博物学传统正是其中的宝贵文化资源之一，面向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同样离不开对诸多博物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运用。[1] 在有关西方博物学传统的梳理中，目前最有影响的类型划分无疑是美国环境史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于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帝国型博物学与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之分。（［2］，pp.19–20）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李猛等国内外学者对于帝国型博物学的历史脉络、运作机制有相当丰富而细致的研究与拓展。[3]，[4] 相比之下，目前学界有关阿卡迪亚型博物学讨论不多，对于该传统的内涵、源流及其当代意义等方面的研究尚有诸多阐发空间。本文试图以西方世界之外的日本为例，从边缘出发重新理解何谓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及其与非西方文明的关联，通过对17世纪以来日本阿卡迪亚型博物学若干重要节点的考察，理解该博物学传统在现代社会的连续与断裂。

一、何谓阿卡迪亚型博物学?

在对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传统的梳理中，沃斯特开宗明义地指出：“这种田园主义观点倡导人们过一种简单和谐的生活，目的在于使他们恢复到一种与其他有机体和平共存的状态”（［2］，p.19）在他看来，《塞耳伯恩博物志》的作者怀特（Gilbert White）正是这一博物学传统的开创者，19世纪的美国作家梭罗（Henry Thoreau）、探险家缪尔（John Muir），20世纪的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卡逊（Rachel Carson）则是怀特的后继者。沃斯特特别指出了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与19世纪的浪漫主义、20世纪的环境保护主义等社会思潮之间的复杂关联。限于全书体例，沃斯特对于阿卡迪亚型博物学的内涵及其古典根源的阐述略显不足。理解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必须追溯到源自希腊罗马时期的诗人忒奥克里托斯（Theokritos）、维吉尔（Virgil）所开创的田园诗传统，源自基督教的伊甸园形象。正是这些丰厚的古典资源滋养了怀特的博物学书写。

阿卡迪亚本为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山区，后来逐渐演变为理想田园的代称。维吉尔的《牧歌》《农事诗》等诗歌不仅勾画了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更是通过月桂、葡萄、牛羊等自然风物构建了一套意蕴丰富的自然意象体系。在维吉尔吟咏的理想世界中，人是多姿多彩而自给自足的自然的一部分，质朴的牧人代表了人与自然之间未被文明败坏的淳朴。这一意象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对于阿卡迪亚的理解。基督教的兴起使得传说中亚当、夏娃居住的伊甸园成为西方文明中人类理想乐园的另一重要源泉。相比于阿卡迪亚形象，伊甸园神话所折射的自然观更加微妙和复杂，帝国型博物学传统亦深受其影响。如果说“堕落”之前的伊甸园生活代表了上帝创造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世界，失乐园之后的人类则不得不通过劳作以恢复人类对于自然的支配。[5] 在某种意义上，以林奈为代表的帝国型博物学正是亚当事业的继承者。（［2］，pp.47–51）另一方面，这种再造伊甸园的冲动也试图恢复伊甸园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从而为阿卡迪亚型博物学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神学支持。

进言之，与其说怀特开创了新传统，不如说他通过具体而系统的博物学实践而将之丰富与光大了。怀特的著述鲜明地体现了阿卡迪亚型博物学的基本特征：第一，强调人与万物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向往天人和谐的乌托邦；第二，致力于以观察、描述、田野等实践揭示自然的内在价值及其多样性、系统性；第三，不同于依赖主体理性的帝国型博物学，它更注重博物学实践中的主体感受、审美等情感因素以及其背后的文化背景。

二、国学与本草学之间的万叶博物学

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密关系常被视为日本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象征四季更替的樱花、红叶更是常常成为《万叶集》《古今和歌集》中诸多和歌所吟咏的主题。在日裔美国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白根治夫（Haruo Shirane）看来，日本文化中随处可见的花鸟风月等自然意象及

其所代表的天人和谐关系，并非源自日本人与自然直接互动的产物，而是源自万叶时代以来歌人对于自然的再创造。（［6］，pp.5–9）正如纪贯之在《古今和歌集》序中所言："夫和歌者，托其根于心地，发其花于词林者也……若夫春莺之啭花中，秋蝉之吟树上，虽无曲折，各发歌谣,物皆有之，自然之理也"。[7]

和歌构成了日本人感受季节变化、表征自然的原型，和歌式自然观渗透到后世的连歌、俳谐、花道、茶道等各类文化形式中。白根治夫指出，和歌式自然观所承载的符号化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真实自然，更倾向于展现出天人和谐的自然形象，温和宜人的春秋二季比之严寒酷暑得到了更为丰富地展现。（［6］，pp.9–13）白根从自然文学视角对和歌式自然观所展开的研究恰恰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可以将类于诗经博物学的万叶博物学定位为日本最初的阿卡迪亚型博物学。

19世纪初万叶博物学的出现乃是江户时代本草学与国学两大学术潮流互动的产物，两者缺一不可。17世纪李时珍《本草纲目》的东传为日本人观察、描述自然提供了典范，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本草学的兴起。贝原益轩、稻生若水等本草家开启的以辨物为核心的智识传统，最终集大成于有日本林奈之称的小野兰山。[8]基于文献传统和田野实践编纂而成的小野兰山的《本草纲目启蒙》成为江户后期乃至明治初期知识人了解动植物的标准参考书。由于早期本草家稻生若水等人多为儒者，故而汉学内部亦不乏诗经博物学著述，如稻生若水的《诗经小识》、冈元凤的《毛诗名物图考》等。本草学与汉学的此类互动无疑为其与国学之间的互动提供了启示。

在日本语境中，所谓国学是指江户中期兴起的，与汉学、兰学相对，研究日本古代典籍如《古事记》《万叶集》等的学问，其目的在于把握和复兴以神道信仰为核心的民族古典文化，与兰山同时代的本居宣长正是复古国学的集大成者。国学家们所欲恢复的古道或神道不仅仅关乎世道人心，同样涉及天人关系，故而理解《万叶集》和歌中出现的一草一木也成为了国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19世纪初本草学的成熟与普及更是极大地便利了同时代国学家们的名物研究，万叶博物学应运而生。万叶博物学的大部分著述旨在以名物考证方式确定和歌中的动植物，进而理解和歌之意蕴。根据和田义一的研究，（［9］，pp.26–27）比较重要的作品主要有小林义兄的《万叶集禽兽虫鱼草木考》、春登的《万叶集名物考》、鹿持雅澄的《万叶品物解》、高桥残梦的《万叶物名考》等。

相比于对塞尔伯恩周围自然环境进行直接而系统的观察的怀特，大部分万叶博物学作品的作者乃是借助于小野兰山等本草家的作品间接地观察、考证文献中的草木鸟兽，本草家畔田翠山则是其中的异数。畔田翠山，名伴存，通称十兵卫，号翠山、紫藤园等。他生于纪伊藩（今和歌山县）下级藩士之家，从本居大平学习国学，随小野兰山弟子小原桃洞学习本草学。受藩主赏识而任藩医、药园园长之职。畔田翠山多次外出采集，足迹遍及加贺白山、越中立山、熊野诸山等。其著述极丰，有鱼类学方面的《水族志》、地方博物志《和州吉野郡群山记》及《古名录》等。

耗费其数十年心力而完成的《古名录》共85卷，大大拓展了万叶博物学的范围。在1843年（天保十四年）所写的序言中，畔田解释道"所谓古名者，始《国史》《国朝本草》《字镜》《倭名抄》《万叶集》，而终天正庆长间"。（［10］，p.1）万叶博物学一变而为国学博物学，举凡国学典籍所载名物，无不被畔田所关注。全书体例仿照《本草纲目》，自水部始，终于人部，条目一般由释名、集注、形状三部分构成。以卷一首条雪为例，首先列出出自《万叶集》的古名，然后依次举出汉名、今名，以及各种异名如六花、白雪，并附有相应的文献出处。集注部分则搜罗了大量与雪相关的记载，涉及《日本书纪》《吾妻镜》到《源氏物语》《古今著闻集》《蜻蛉日记》等数十种典籍。形状部分则引用了《荣花物语》《枕草子》等作品中涉及雪之形态描述的部分。（［10］，pp.3–22）

畔田对于万叶博物学的拓展绝不局限于考察范围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对于名物考证模

式的超越。受兰山学统的影响，畔田常年出入于深山幽谷，留下不少田野考察的文字和图像记录，以《和州吉野郡群山记》最为典型。其中除了记录路程与所见风景之外，对于沿途所见动植物记载甚为详细。可以想见，研习国学极大地激发了畔田的民族文化认同，更是其数十年野外考察的重要动力。对于崇山峻岭中一草一木的亲眼目睹则反过来促使其超越万叶博物学的考证模式，生长于本土的动植物而非出现于日本典籍中的和名成为了畔田翠山首要的关注对象。当明治时代博物学家白井光太郎于1890年代调查吉野植物，投宿于吉野山中的前鬼村，旅店主人的老父亲闲聊时提及，四十余年前纪州藩一位名为畔田重兵卫的本草家，带一仆人来此“采药”。（［11］，p.5）对于居于深山的老人而言，畔田的“采药”无异于白井的植物调查。白井等明治新一代博物学家对日本各地动植物的调查也和畔田翠山一样，潜藏着浓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三、博物学家南方熊楠与森林保护

如果说万叶博物学中的民族主义情感更多是出自对日本古典典籍中的理想古代世界的憧憬，其中对于自然的感知、审美源自符号化自然，面对明治时期近代化所带来的巨大环境破坏，面临着消失危险的自然风景成为明治知识人十分关心的议题。地理学家志贺重昂于1894年发表的《日本风景论》将国粹主义融汇于科学世界观之中，可谓是万叶博物学的近代转化。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在近代日本的展开并不限于科学世界观下的观念更新，更重要的是相比对自然的观察、描述，自然保护成为了其中最富紧迫性的课题。同时代欧美国家的自然保护运动对日本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留德背景的东京大学植物学教授三好学自1906年起大力倡议自然纪念物保护，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日本政府于1919年颁布了《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而在20世纪初的神社合祀反对运动中积极发声与抗争的南方熊楠则堪称民间自然保护运动的先驱。

出身商人家庭的南方熊楠，和畔田翠山一样，同为和歌山县人。他自小爱读《和汉三才图会》《本草纲目》《大和本草》等书籍，在和歌山中学毕业后求学于东京大学预科。1886年开始留学美国，1892年至1900年定居于伦敦，期间任职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并与流亡伦敦的孙中山结为莫逆之交。1900年回国后定居于和歌山田边市，后半生致力于菌类、地衣等孢子植物的采集分类研究。南方熊楠在博物学、民俗学上著述极多，在《自然》《释疑》（*Notes and Queries*）等杂志发表数百篇论文，著作有《南方随笔》《十二支考》等。

所谓神社合祀政策，乃是自1906年开始，由当时日本内务省神社局所主导推进的以一町村一神社为原则的国家政策，其目的一方面在于强化国民统合，另一方面也是地方政府改良的重要一环。在神社合祀政策推进过程中，各地方的大量神社被强制合并。以南方所在的和歌山为例，神社合祀政策实施数年之后的1911年，全县留存的神社为726座，留存者不到1904年的八分之一。（［12］，p.234）神社合祀政策初看只是关乎宗教信仰，却对地方的自然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神社的周围一般分布着由松树、杉树等常绿乔木构成的大片森林，被视为神明居住的神圣空间即所谓镇守之森。[13]神社合祀使得大片由于“千古不入斧”的传统禁忌而得以保存的原始森林面临着被开发砍伐的境地。在历史学家武内善信看来，南方熊楠的神社合祀反对运动的最大驱动力与其说是保护神社不如说是保护神社周围的镇守之森。（［12］，p.224）

南方熊楠对于神社合祀政策后果的关注与其植物采集活动有关。他于1906年6月在田边市丝田的日吉神社周围森林发现了黏菌新种灰绿团网菌（Arcyria glauca），2年之后重游此地却发现该地森林被破坏殆尽，黏菌栖息地被破坏的冲击促使其关注神社合祀政策。[14]自1909年秋始，他开始全身心投入神社合祀反对运动，除了在本地的《牟娄新报》发表见解，亦向大阪《每日新闻》等报刊积极投稿。为了联络同志，数年间他向人类学家坪井正五郎、民俗学

家柳田国男、植物学家白井光太郎、松村任三（1856–1928）等学者去信表明看法。此外，他还联合本地议员中村启次郎（1867–1937）与中央政府交涉，积极参与本地居民发起的神社合祀反对运动。（［12］，pp.242–260）虽然最终并未扭转官方政策，至少在部分地方的森林保护上南方熊楠达成了目标。田边市田边湾内一座无人岛神岛的森林砍伐活动得到了遏制，并于1911年成为保护林，1935年升级为国家级天然纪念物。

南方熊楠的自然保护实践体现了鲜明的阿卡迪亚型博物学特征。在他看来，神社合并破坏的不仅仅是神社本身，而是围绕神社这一神圣空间所形成的天人和谐秩序。神社周围的镇守之森绝不仅仅是可供经济开发利用的森林资源，而是地方社会的生命共同体的体现。南方熊楠眼中的镇守之森十分接近自然圣境的概念，特定的地理环境、信仰、崇拜对象构成了自然圣境的三要素。[15]类似于神道教的镇守之森，缅甸蒲甘的佛教圣山波帕山、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神山大黑山均是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自然景观，而这一景观的形成乃是自然与文化长期协同进化的结果。在生态学初兴的二十世纪初，南方熊楠对于神社镇守之森的保护与其说基于其生物学理论的认识，不如说是出自一位博物学家对本土环境的热爱。

长期旅居英美的经历使得南方熊楠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早在投身于神社合祀反对运动初期，在1910年初写给人类学家坪井正五郎的信中，他就提及了《自然》杂志中有关英国、德国自然遗产保护的报道。而在《东京人类学会杂志》发表的相关论文则表明他同样十分熟悉美国加州约塞米蒂地区的水利开发反对运动，而组织反对赫奇河谷（Hetch Hetchy）水坝建造计划的正是大名鼎鼎的美国环保运动先驱缪尔。正如武内善信指出的，南方熊楠对于欧美国家自然保护的关注和介绍，不仅仅是以他山之石攻玉，而是将自身的斗争理解为世界自然保护运动中的一环。（［12］，pp.275–294）进言之，对南方熊楠而言，即使是一片不起眼的神社森林，也是森罗万象的大自然构成的宇宙曼陀罗的一部分，其中也许蕴藏着全世界都未曾发现的菌类、蕨类，森林的破坏绝不仅仅是地方社会或日本人的损失，而是全人类的损失。

四、共生的里山模式

南方熊楠围绕着神社镇守之森所展开的自然保护斗争应对的是近代化所带来的巨大环境破坏，战后日本高速增长时代各地居民围绕着水俣病、痛痛病等环境污染展开的社会运动所面临的挑战是类似的即经济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而自1970年代以来，伴随着西方环境保护运动的兴盛以及日本社会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介于深山和人类聚落之间的里山逐渐被视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自然空间。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在名古屋召开，日本环境省与联合国大学高等研究所共同发起“里山倡议”，提倡与可持续发展原则相符的自然资源利用和管理方式，以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该倡议将里山界定为“人与自然长期互动形成的人类居住地与次生林、农田、草地等多样生态系统构成的马赛克复合式景观”。[16]

正如南方熊楠的自然保护实践促使时人认识到神社周围镇守之森的价值，里山作为一种富有价值的特殊自然空间也是在战后日本社会的自然保护运动中被逐渐发现和承认的。围绕着里山所展开的种种观察、描述、保护实践毫无疑问属于日本阿卡迪亚型博物学的当代形态之一。在1980年代之前，里山一词主要指当时农村社会生产生活中堆肥、烧炭所需的农用林，使用者也局限于林业方面相关人士。[16]正是在自然保护实践中，里山一词开始被越来越多人使用，其含义也不断得到拓展。最早将里山与自然保护相联系的是1976年成立的大阪自然环境保护协会。为了培养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人才，该协会自1978年起开设了名为博物学家的系列讲座，介于农地和深山之间的里山正是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时常被提及。此后该协会还发起了“里山动物调查”等活动，极大地

促进了里山一词的传播。（[16]，pp.65–66）进入1990年代，由京都大学生态学教授田端英雄等发起的“里山研究会”在自然保护实践中极大地丰富了里山概念的生态学内涵，开始逐渐意识到与浅山林毗邻的农田、池塘、水渠等农耕环境对于维持里山的生物多样性不可或缺。（[17]，pp.316–317）2002年，在日本环境省发布的第二版《生物多样性战略》中，“人类活动减少及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导致的里山生态劣化”与物种灭绝、外来种入侵并列为影响生物多样性的三大危机。以2010年的“里山倡议”为契机，环境省推动了“重要里山里地”评选等一系列里山保护行动。

作为阿卡迪亚型博物学的里山模式呈现出三大特色：第一，对于次生自然的动态理解。相比于未受人类侵扰的深山、深海、雨林等原生自然，基于农林业等人与自然长期互动而形成的次生自然景观常常被认为在生物多样性上乏善可陈。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耕地抛荒、城市开发与环境污染导致水田、次生林等次生自然环境中的生物多样性也发生急剧地变化。正是身边熟悉的草木乃至鸟类的消失令生态学家意识到里山并非贫瘠单一的自然，农林业等对自然的人为扰动保持了里山的丰富性。（[17]，p.316）任职于农业环境技术研究所的守山弘教授指出，通常被视为常绿阔叶林被砍伐后而出现的杂用林实际上是一种保留猪牙花、日本虎凤蝶等特有种的独特生态系统，具有不逊于原生林的价值。（[18]，p.1）农学、生态学、园林学等不同领域学者对于次生自然的积极探索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于里山概念的界定和理解。

第二，保护与干预并重。不同于一般自然保护活动对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的强调，里山模式主张人类活动对维护次生自然有着积极影响。据日本环境省统计，里地里山约占日本国土面积的四成，（[19]，p.1）伴随着日本农村地区人口不断下降，自然资源的利用不足而非过度开发成为了里山地区面临的最大挑战。里山模式倡导在环境限度内的自然资源利用，通过立足于本地的自然资源循环利用方式，打造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农林业。

第三，传统的现代转化。以农林业为核心的传统生产生活知识与现代科学一道服务于本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基于神道教信仰的森林保护、基于当地自然资源形成的手工艺乃至作为本地文化景观的节日庆典，都构成了里山模式的内容之一。

结　语

在1967年3月发表于《科学》杂志的历史名文《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指出当前的生态危机乃是源于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解决危机的出路在于改变我们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20]，pp.89–90）在全球变暖等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今天，怀特五十余年前作出的诊断依然有力。要想打破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我们需要从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人类诸文明中寻求思想资源，追求天人和谐的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可谓重要候选之一。

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传统虽以英国吉尔伯特·怀特、美国梭罗等最富代表性，但绝非限于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之外的日本亦有扎根于自身风土的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传统。江户时代本草学的发达与国学的流行共同造就了试图以名物考证方式接近古代理想世界的万叶博物学。江户晚期本草家畔田翠山开始超越名物考证，以亲验目睹方式直接观察、描述自然。进入明治时代之后，博物学家南方熊楠在神社合祀反对运动中积极参与神社森林保护，并在自然保护实践中丰富了人们对神社森林的价值的认识。在战后日本社会的自然保护运动中，介于人类聚落和荒野之间的里山被逐渐确立为有着独特价值的自然景观。以里山为核心的里山模式成为了当代日本社会寻求人与自然共生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典范。在从19世纪初到21世纪初的种种阿卡迪亚型博物学实践中，可以发现日本自身的民族传统一直被视为非常重要的价值源泉。这种传统可以是承载了古代理想世界的典籍、象征了自然圣境的镇守之森、作

为原风景的里山。某种意义上说，同时具备文化多样性和自然多样性的里山成为了当代日本人眼中的自然圣境。面对现代性带来的多重冲击，基于民族传统的日式自然理念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被视为现代世界边缘的田园乡村反而提供了一种解决现代性引发的环境危机的可能性。

［参 考 文 献］

[1] 刘华杰. 论博物学的复兴与未来生态文明[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7,（5）: 76–84.
[2] 唐纳德·沃斯特. 自然的经济体系: 生态思想史[M]. 侯文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3] 隆达·施宾格. 植物与帝国[M]. 姜虹 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9.
[4] 李猛. 班克斯的帝国博物学[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13–18.
[5] 彼得· 哈里森. 人的堕落和科学的基础[M]. 张卜天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6] Haruo, S. *Japan and the Culture of the Four Seasons: Nature, Literature, and the Art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7] 纪贯之. 古今和歌集[M]. 杨烈 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8] 邢鑫. 多识草木: 日本近世博物学传统及其转化[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7.
[9] 和田義一.『萬葉集禽獸蟲魚草木考』の成立について[J]. 國文学, 1997,（76）: 26–49.
[10] 畔田翠山. 古名録[M]. 第一册, 正宗敦夫 編, 東京: 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 1934.
[11] 畔田翠山. 和州吉野郡群山記: その踏査路と生物相[M]. 御勢久右衛門 編, 東京: 東海大学出版会, 1998.
[12] 武内善信. 闘う南方熊楠: エコロジーの先駆者[M]. 東京: 勉誠出版, 2012.
[13] 王守华、王蓉. 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274–278.
[14] 田村義也. 南方熊楠の「自然保護」[J]. エコ·フィロソフィ研究, 2017,（11）: 19–33.
[15] 裴盛基. 自然圣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J]. 科学, 2006, 58（6）: 29–31.
[16] 岡田航.「里山」概念の誕生と変容過程の林業政策史[J]. 林業経済研究, 2017, 63（1）: 58–68.
[17] 田端英雄. 里山研究会[J]. ランドスケープ研究, 1997, 61（4）: 316–317.
[18] 守山弘. 自然を守るとはどういうことか[M]. 東京: 農山漁村文化協会, 1988.
[19] 环境省. 里地里山保全活用行動計画[OL]. https://www.env.go.jp/nature/satoyama/keikaku/1-1_keikaku.pdf. 2022-04-15.
[20] 林恩·怀特. 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J]. 汤艳梅 译, 都市文化研究, 2010,（6）: 82–91.

［责任编辑　李斌］